

时下有“仇官”、“仇富”之说，笔者以为这都是些伪命题，且有转移社会焦点和“抹黑”普罗大众之嫌。老百姓“仇官”主要是仇贫，他们仇过像谷文昌那样的官吗？“仇富”主要是仇掠夺，民众仇过像姚明那样的富吗？但是，时下有一种“仇富”却被“忽略”了，那就是权力仇富，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最后往往演变成权力夺富。

权力夺富的前提，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大行其道，在皇权社会，遍布这样的前提，故权力夺富在封建社会屡见不鲜。汉桓帝时期，外戚权臣梁冀独霸朝纲，权力使他富甲天下但仍贪得无厌，于是，他发动了一场“黑打”运动，派出亲信分别到管辖的各县，调查登记当地的富人及其财产，然后冠以罪名将这些富人下狱，严刑拷打让他们用钱顶罪。汉献帝初平元年，董卓将洛阳城中的富豪全部逮捕，然后安个罪名诛之，没收其财物，死者不可胜数。

类似的事，历代不绝，今天仍不鲜见。2011年10月，财新网在京召开了“公权力与民营企业家财产权利保护”的研讨会。与会专家认为：“个别官员凭借手中权力，肆意掠夺民营企业家财产，甚至对其罗织罪名，施以酷刑，这种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。”

权力夺富可分两种，一种是明火执仗。比如朱元璋夺

## 新锐短评

### “跨省撤稿”的耻辱

近日，有网友称福建交通厅厅长李德金手戴5万元雷达钻手表，腰系万余元爱马仕皮带。原本云南《都市时报》要推出《福建“表叔厅长”来了》，数十万份报纸已印刷，凌晨被“跨省撤稿”，已印刷报纸被封存。该报负责人称，作为媒体人，“从未感到如此愤怒和耻辱”。这一事件性质非常恶劣。简单而粗暴地对待舆论监督，不但不可能堵住世人的口目，反而欲盖弥彰。动用公权力封杀舆论监督报道，只能制造新的、更大的舆论危机，造成更多公信流失。（摘自《新京报》10.11）

### 韩国为何废除网络实名制

韩国是个互联网非常发达的国家，2007年韩国就实行了网络实名制。然而，今年8月23日，韩国宪法裁判所全体审判官一致做出了“网络实名制”违宪决定，从而使引入仅5年的网络实名制将寿终正寝。韩国反对网络实名制的声音始终存在。早在2005年就有社会团体反对网络实名制。他们认为网络实名制将导致言论自由的萎缩、个人信息的暴露、以偏概全，是对“有良心的因特网公众”的不公平。更重要的是，实行网络实名制，每个人的网上活动都有记录，会在韩国形成一个“恐怖的监视社会”。

（摘自《新民周刊》2012年第36期 詹小洪/文）  
养老不能“让领导先走”

近日，记者走访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地多家养老院发现，原本应该接收三无老人、五保老人等弱势群体的公办养老院，因“物美价廉”成为“特权”老人争相享用的“蛋糕”。退休干部入住“零负担”，困难老人被拒之门外。日常生活中不乏“让领导先走”，但是在养老市场上，大家都是布衣，却还是遵循“让领导先住”的潜规则，说来不禁让人寒心。和入托难一样，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，总有人能近水楼台先得月。这就要求我们采取技术手段从制度上加以平衡，例如采取电脑随机排队，让有限的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。

（摘自《钱江晚报》10.12 付瑞生/文）  
吴敬琏的忧虑

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微博中摆出了一组数据：1990年，人民币发行总量为1.53万亿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，货币量约40万亿；2011年，货币投放达85.16万亿；至2012年5月底的最新数据是90万亿，距百万亿大关，近在咫尺。

说不知道，一说吓一跳！人民币的发行量在21年间翻了近59倍。吴敬琏站出来，忧心中国的货币超发，用铁的数据说话，显示了一个学者的良心、良知。假如经济的发展，凭超发货币、大量投资就可以大功告成，那么多办几个印钞厂、多开几台印钞机，也就万事大吉了。只可惜它不符经济学的常识。吴敬琏为货币超发、无节制的大投资而忧虑，绝非杞人忧天。

（摘自《湘声报》10.12 乐朋/文）

# 权力夺富最可怕

沈万三之巨富，西晋孙秀发石崇之横财，以及梁冀、董卓的行为等等。

由于权力的不可抗拒性和其本身所裹挟的巨大暴力，因此，它有着雷霆万钧之力。不管多大的老板，多雄厚的财富，权力所指，一夜之间就会使其家破人亡、灰飞烟灭。另一种是暗中运作。比如今天山西繁峙县的反贪局长穆新成，个人资产就达2亿多。巨额财富靠“以办案为名的敲诈”，迫使老板“进贡”消灾而来。这“办案”就是“曲径通幽”，就是一块“遮羞布”，背后仍是权力的威力。

若这个社会权大于法，那么权力是石头，富豪是鸡蛋；权力如老虎，老板似兔子。然而，不管这种夺富多么荒唐，权力都会打着“依法”的旗号。卑劣如董卓者，都懂得这一点，何况今日的部分“聪明人”。

古今中外，那些靠劳动和智慧发财的富豪，多是精明的企业家和商人。他们及其企业，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，是社会前进和发展的动力。夺富的结果会对社会造成重大伤害和灾难。建国后的前三十年，我们几乎从经济上消灭了所有的富人，也消灭了民营企业，甚至补锅、卖烧饼的也进入了“大集体”。但最终的结果是，不但没有使老百姓走向富裕，反而驶向了全民贫穷。

（摘自《清风》2012年第8期 刘吉同/文）

## 抵抗疯狂的英雄

今天看到的德国年轻人，他们是充满自信的。他们的自信从哪里来？

在德国柏林，有一个本德勒建筑群。它是著名的第三帝国建筑。在二战期间，这里是德军司令部。现在，楼上是一个信息密集的永久性展馆，主题是德国对纳粹的抵抗运动。它收集了许许多多的人物故事，有反抗纳粹的犹太人；有大量协助犹太人躲藏和逃离的普通德国人，其中就有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的原型；有宗教界、文化界人士的反抗；有自发的抵抗运动小团体，还有体制内的、甚至军界的抵抗。

展览馆之所以设在这里，就是因为这个展馆的一个房间，曾是在希特勒脚下安放炸弹的军官斯陶芬伯格的办公室。1944年7月20日，斯陶芬伯格刺杀希特勒未遂，就是在这间屋子里被逮捕，就从这个楼梯被带下去，就在下面的院子里，与他共谋的另外三名军官一起，被枪杀。就在他们就义的地方，今天站立着石雕全身像：一个裸体的、双手在身前被捆绑的、沉稳的人。站在他面前，读过这段历史的外人，都难以无动于衷，更不要说那些德国年轻人了。

这个展馆到处都有放在墙边、角落的凳子，是给德国学生来这里上历史课用的。这里展示的是他们的英雄。参观的学生看到和自己一样的年轻人，汉斯·萧和索菲亚·萧兄妹二人发起的白玫瑰抵抗小组，他们和一批同龄人、他们的教授，最后都被纳粹处以绞刑。他们是真正的德国人。

2005年，在柏林的勃兰登堡门旁，建立起一万九千平方米的欧洲遇难犹太人纪念碑。在那里，也随时可以看到一群群中学生在上历史课。德国人的自信来自正视自己的历史，也确立了象征真正德国精神的英雄，这些英雄追寻的价值，不仅是德国的，更是普世的。

我想起中国人也常常提及国民性，因为我们有过文革这样的疯狂。可是在疯狂中，也有无数对疯狂的抵抗者。假如我们回避自己历史上的黑暗和罪恶，假如在我们对青少年的教育中，不提及我们黑暗年代中的那些英雄、不确认他们和普世价值同构的民族精神，那么，我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都可能是混乱的，我们的民族自信也很可能是虚妄的。

（摘自《新京报》9.29 林达/文）

## 我们总是仰仗陌生人的仁慈

果我们得病住进医院，陌生人切开我们的身体、清洗我们、护理我们、杀死我们或治愈我们。如果我们死了，陌生人将我们埋葬。

“不管你是谁，我总仰仗着陌生人的仁慈。”这句话在美国红了30年。然而，30年前生活在浓郁的集体主义气氛中的国人，骤然被置于此，有着强烈的心理焦灼和不确定性。一方面“不要和陌生人说话”，另一方面抱怨人性冷漠；一方面指责他人麻木不仁，另一方面又提醒亲人朋友遇事少“出头”；一方面跟网上的陌生人说心里话，而和最近的同事保持距离。因而，“当国外盛谈中国要不要摒弃欧洲之时，中国的老人倒了却没人扶；有人在家挖地窖关‘性奴’时，单位领导、片警、邻居却没人知道……”互不信任增加了社会运行成本，也让人的情绪变得负面纠结。陌生人社会没有真正到来，信任空白成为社会转型的阵痛，并且还在持续，大多数民众还缺乏现代意识、公共意识。

接纳陌生人，是一种向善的力量，社会信任体系的重建将从对陌生人释放的善意上开始萌发。风靡世界的“抱团团”运动，虽然有些造作，但已显露了这种征兆——对“陌生人”的接纳，是一种更高的文明尺度。

（摘自《三月风》冯欢/文）

近日，有两则关于路桥收费取消后出现相似管理情状的报道，值得放在一起关注。

政府不能无收益则无责任

路桥收费的取消，意味着当地政府放弃一笔可观的财政收益，但放弃收益并不意味着也放弃公共管理责任。政府担当的公共责任是在任何时候、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履行的。没有经济利益就不履行管理责任，政府无异于企业，只做对自己有收益的事。

在现实中，不少政府部门有时是无收益则无管理、无责任，有时是管理的积极性不高，对责任的承担不够，而有收益的事都争着去做。比如，很多管理事项都少不了收费，但一些事项实际管理并不多，问题没解决多少，精力可能放在收费上去了，结果管理就是收费；而一些时候，政府部门为了收费，甚至额外设立管理事项，任意扩大权限，为收费而“管理”。让经济利益主宰公共管理，不仅让公共管理丧失本来源，也让政府失去本义。

（摘自《长江日报》10.15 李建华/文）

# 我在中南海推销原始股

今天，中国的股市发展如火如荼，但是发生在22年前、国庆40周年前夕的“中南海里购股票”风波事件，我（当时在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信息处工作）作为此事的见证人现在回忆起来仍然觉得挺有意思。

1988年9月11日，《人民日报》第一版刊登了一则报道，标题是《中南海里购股票》。报道总共不到300字，介绍了“中南海国务院大院里，汇集了很多人，都在踊跃购买一种从来没有买过的东西——股票……”

当日早6点半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《全国新闻联播》广播了这一消息，没想到这条消息炸了锅。当日上午9点，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立即向国务院办公厅：“谁在中南海里卖股票了？”特别敏感的外国新闻记者也广泛报道。许多股份公司的人打电话问我，他们能不能也到中南海发股票？

我们在发行桌前整整呆了一下午，应该说，发行工作不理想。其原因：一是许多机关干部都不懂股票，二是当时人们手中余钱都是少得可怜。我记得我当时银行存款不足1000元，要拿出100元买一张前途叵测的“纸”，还真得掂量掂量啊。

但总有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。大约

下午2点40分，国家体改委经管司的一位干部率先打破僵局，买了一股（每股100元），算是开盘了。接着，经管司的其他人也买了几股。

当时他们买股票，绝对没有任何想发财的目的。从小的方面讲，纯粹是为了改变金杯发股票冷场的尴尬局面；从大道理讲，是支持股份制发展，用自己有限的资金支援企业建设，其行动非常可贵。

一直到4点左右，发行工作马上要结束时，奇迹出现了。

此时来了一位姓柴的小伙子，从包里拿出一万元现金，二话不说买下了100股。我当时真没见过那么多钱，看得我都眼晕。我问小伙子：“你干嘛买这么多股票？”他答：“我准备出国了，这些钱留着也没用，干脆买股票吧！”我说：“你知道股票是有风险的吗？”他答：“有风险就有吧，再说，招股书上不是写明每年有16.5%的利息吗？”

我又进一步和他攀谈得知，他本人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，他父亲是国

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干部。他是听他父亲说院里正在卖股票（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体改委在一个院内办公）。这是当天金杯股票最大的一个买主。

就这样，整个发行工作基本上是在冷冷清清中收盘了。但这个不起眼的发行事件后来掀起了一阵挺大的动静，这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《中南海里购股票》的报道风波。

《中南海里购股票》的报道刊出后，有关领导也找我询问此事的来龙去脉。我如实汇报。为澄清这一事实，我又赶紧写了一篇报道，指明了“在北京西安门大街某国家机关大院内进行了试发售……”，从而澄清外界的误传。

9月15日，《人民日报》也发出重要更正，指出“9月11日本报一版刊登的《中南海里购股票》一文，是一篇完全失实的报道……”

至此，这炸了锅的风波才趋平。那

事

中方求证，“苦果”究竟有什么含义。

面对中方的强大压力，法国最高层权衡利弊，最终做出了停止这笔交易谈判的决定。法国外长1990年1月6日约见我驻法大使，称“法国最高当局领导决定，法国将不再继续与台湾作军舰生意”。但是，这样一个私口头承诺对中国方面是不够的，一个公开正式答复才有可信度，才符合外交原则。但法方始终不愿就此公开表态。

第二天，新华社发布消息说：“法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，竟然于最近作出决定，允许向台湾出售6艘拉法耶特级轻型护卫舰。”消息字数不多，分量却很重，立即引起法国舆论的高度关注。法新社全文转发了这条消息，特别是对“不顾”和“竟然”这两个词加以强调和解读，认为这是“中国官方通讯社对法方提出的指责”。

我驻法大使馆遵照国内指示，同法国当局进行了紧急和严正交涉，指出一贯坚持原则立场的中国政府和人民是“绝对不会吞下这颗苦果而不做任何强烈反应”的。

中方的有力言辞对法方产生了一定的震撼作用。有媒体评论，这番话不像是一般级别的

人所说，肯定来自最高层。还有人甚至向

台湾出售护卫舰的新闻。

（摘自《环球》第14期 沈孝泉/文）

1980年10月20日，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44周年，我们在《人民日报》副刊头条位置刊登了雕塑家潘鹤的精品鲁迅像，像下排了一首短诗《假如他还活着》：

假如他还活着，我不知道人们将对他怎样称呼？假如他还活着，我不知道他会怎样向后辈嘱咐？他也许正身居高位，但他也许——不过是普通一卒。官高，他不忘甘为孺牛之诺，位卑，他绝无丝毫奴颜媚骨。他也许已经得到了种种荣誉，但也许——才刚刚从狱中放出。荣誉中，他感受到新的呐喊、彷徨，监狱里，他会写出新的《准风月谈》、《伪自由书》……他也许不再用那张印花包裹去装他的讲义，但决不会盛气凌人地昂首阔步；他也许要出席一些重要会议，但不会跟着三个警卫，两个秘书。他也许坐上了现代化的轿车，但决不用窗帘把路边的一切挡住，……

谁料得，没有多久，麻烦就来了。报社领导传达中央某领导同志的关注，先是查问此诗有什么背景？作者是谁？我们当即据实报告：作者是绍兴一位中学教师，诗是他自己寄来的，不是报纸约稿，他同编辑部任何人都没有关系，如果说有什么背景，唯一的背景就是他是鲁迅家乡的一位教师，仅此而已。

但是，麻烦并未结束。追查者继续质问：为什么要这样写？作者的矛头针对谁？影射谁？我们答：看不出他的“矛头针对谁”，也看不出他要“影射谁”。质问者就指出：现在谁能在出外时“跟着三个警卫，两个秘书”？这不是明摆着影射谁谁吗？刊登这么一首诗，是什么居心？什么用意？据传达者说，已经上纲到“一首反革命诗”的了。

原来，当年中央音乐学院报考人数据到空前的17285人。但是，这一届的招生名额却只有105人。特别是作曲系，考生人济济，却仅有只有10个人的名额。这些天才，注定会有人被挡在门外。但，他们遇到了“贵人”。老3楼的圈子

邓启元是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68届学生，毕业后分配到铁路文工团。他和储望华是“哥们儿”。杨峻、潘一飞和储望华同为钢琴系青年教师，且都住在音乐学院老3号楼宿舍，也便和邓启元混熟了，常聚在一起。杨峻的妻子、管弦系青年教师左因也常常参与，老3楼一楼的杨家便成了他们的据点。

左因人脉广，常热烈地说起听来的各系的招生盛况，其他人也纷纷兴奋地说起自己所知的情况。眼看着这些难得的、多少少年才积攒下的音乐天才们没有机会入学，大家都替学校深感惋惜。他们太知道考生的不容易了。

“上书邓小平”

邓启元的叔叔邓力群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副主任，是邓小平班子中的重要一员。邓启元经常去见叔叔。“我记得他当时主管文化、艺术、教育、科学这一块，所以我经常去他那儿向他汇报一些文艺界的情况。”邓启元



1977年的“上书信”原件，其上有邓小平的批示以及其他4位领导的圈阅。

元的家中，邓启元接过信件后，就像传递火炬接力棒似的，随即又踏上他的自行车，飞奔到他叔叔邓力群家。

两天后的12月11日，邓小平的批示下达：“看了这封信反映的情况，很高兴，建议予以支持。华主席，先念，登奎，乌兰夫同志阅后交文化部党组处理。”

“我们每个人都很激动，在潘一飞家里搞了一个小型的庆贺会。”邓启元笑着说明。

77.78级神话

当年，中央音乐学院原定录取105人，结果录取了213人。作曲系因为人才众多，由原定的10个名额，增加到36个。

最终，1977、78级作曲系出了一大批享誉世界的作曲家，如谭盾、叶小钢、郭文景、陈贻、瞿小松、陈其钢等，开创了音乐学院77、78级神话。

那年